

工業化對臺灣親屬關係的影響

蔡采秀*

一、研究動機

工業化對人類各層面的生活所造成的衝擊，一直都是社會學家非常關心的焦點。傳統社會所賴以維繫的親屬關係在現代的都市化工業社會中愈來愈淡薄，也引起許多社會學者的注意 (Adams, 1970:163 ; Lee, 1980 ; Parsons, 1949)。

西方從一九五、六〇年代以來的親屬研究相繼指出，現代社會的親屬關係有兩個特徵，第一是親屬間互動頻率的降低；其次是親屬互動有偏向女方的現象。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現代社會中愈來愈多Parsons(1949)所謂的「孤立的核家庭」 (isolated nuclear family)。孤立的核家庭是指，核心家庭和親屬間的互動無論是在質上或量上，均顯著的低於其他類型的家庭；在質上，核心家庭的親屬互動已不像傳統社會那麼密切而多面；在量上，核心家庭的親屬數目一方面較少，另一方面也由於社會活動空間的擴大而分散。其次，所謂的偏女方現象乃是指，核心家庭在親屬關係的發展偏重女方親屬，不但已婚婦女有百分之六十和自己的父母居住，而且，無論在婚姻的早期或晚期，男性覺得親近的親屬是姻親的要比女性多，提到的數目也比女性多 (Bahr, 1976 ; Coult et al., 1971 ; Komarovsky, 1967 ; Reiss, 1964 ; Robins et al., 1962 ; Sweetser, 1968)。

西方社會所以有這些現象，有些學者認為是受工業化的影響。Sweetser (1968:236)就指出，偏女方的不均衡現象乃是現代工業都市社會的特徵，並非西方所特有的現象。換言之，持這種論點的學者認為，這些現象乃是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只要有工業化的地方，就有這些現象。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注意到其他較屬於規範性層次，例如，像次文化價值、親屬規範等因素的影響。前者我們可以姑且稱之為「工業化論」，後者則可以稱為「規範論」。規範論者除了從各種文獻去證明西方這些現象早在工業化之前就已經出現外 (Demos, 1970; Laslett and Wall, 1972; Parish and Schwartz, 1972; Wrigley, 1972; B. Laslett, 1975, 1977; E. Smith, 1978; Lee, 1980:194)，他們並且開始注意到親屬關係所涉及的對象，以及影響親屬關係的各種社會環境條件 (Anspach et al., 1973:437)。很多研究逐漸著重在不同社會條件之間的比較，而不再只作同一種社會條件的

*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暨兼任講師

探討，例如，從只是研究都市地區的親屬互動頻率，轉變到作鄉村和都市地區的親屬網絡比較(Key,1961;Bultena, 1969; Lee,1980:194)。同時，也開始注意到非核心家庭內的親屬對於核心家庭的家計或家內單位構成的相關程度。

如果親屬關係的淡薄和偏女方現象是現代工業都市社會的特徵，那麼這些現象應該是普遍存在於任何工業化和都市化的社會。但根據一些經驗研究顯示，臺灣在邁入全面工業化都市後(孫清山，1985)，卻沒有出現這些現象，無論是在都市或鄉村中的親屬關係，均很一致的仍保持著傳統的父系色彩，同時，也相當重視親屬間的關係(Hsieh, 1982 ; 文崇一等,1984, 1986 ; Gallin, 1985)。不過，這種情形似乎也有改變的跡象⁽¹⁾。Tsui (1987)對於臺電員工的研究發現，女兒在結婚後並不像傳統上和娘家中斷所有的經濟關係，反而還保持著密切的社會經濟互動，尤其是高教育和外省的婦女尤然。這種現象讓筆者不得不懷疑：親屬關係的淡薄和偏女方現象究竟是否如西方學者所說的，它們是現代工業都市的特徵？抑或只是西方社會的獨特現象？當然，臺灣社會究竟是否真是個例外仍有待商榷，因為臺灣的這些經驗研究沒有一篇是完全針對親屬關係所作的系統研究，它們彼此間在方法上或樣本上的分歧讓我們必須對這些結論採取較為保留的態度。因此，筆者希望能運用全臺性資料，同時從工業化論和規範論的角度來探討臺灣是否和西方一樣，在受工業化衝擊後，有發生親屬關係變得淡薄和偏向女方的情形。

這篇文章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透過臺灣這樣一個單系父系親屬規範社會的親屬關係，了解工業化和親屬規範之間的互動，是否如西方的雙系親屬規範社會一樣，會使親屬關係淡薄和偏向女方發展。因此，這篇文章將針對以下的問題進行探討：

第一是，臺灣的核心家庭和雙方出身家庭父母之間的親屬關係在全面工業化以後的發展情形。

第二是，臺灣的核心家庭和雙方出身家庭父母之間的親屬關係發展是否也和西方一樣，因工業化而有偏女方的現象？有的話，是那些因素所造成？沒有的話，又是為什麼？

二、文獻回顧

工業化對親屬關係的影響過程，西方的親屬研究主要是透過四個機制來說明：第一是都市化，第二是工業化和都市化所造成的大量遷移人口，第三是工業社會中的家庭結

(1)這究竟是不是「改變」恐怕還有待爭論。林耀華先生(1977:14, 宋和譯)就曾企圖指出，一般對於傳統中國家庭和社會制度的看法是相當不切實際的。他的論點似乎意味著，傳統中國的社會制度並不那麼「父系」。

構，第四是工業社會中生產工具的改變。

第一是都市化的影響。都市化對親屬關係的影響，一般都化約成都市和鄉村兩種不同居住環境的比較，Wirth在他的「都市性作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提到，都市中不同出身背景的大量人口匯集，會使民俗傳統要求幾代人同住的親屬聯帶消失或者相對的削弱(1951:53)。一九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很多親屬研究也發現，鄉村居民的親屬關係比都市居民密切 (Bahr, 1976; Key, 1961; Struss, 1969; Mirande, 1970; Fischer, 1984)，但是，也有研究發現，都市居民比鄉村居民較常去看他們的父母 (Bultena, 1969, 見Adams, 1970:176)。於是，有些學者開始注意到這可能不純然是由於都市性所造成的，由工業化造成的大量遷移人口可能是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兩者間會有混淆效果，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變項對親屬互動的影響(Lee, 1980:927-929)。因此，遷移必需被當成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來分析。

第二是大量遷移人口的影響。遷移對親屬互動的影響早在一九六〇年代時已經注意到(Key, 1961; Bultena, 1969)，但到一九七〇年代才有學者針對移民者和當地居民的親屬連帶進行比較(Hendrix, 1975, 1976, 1979, Winch, 1977)。他們發現，由於遷移者在當地較不可能有親屬，因而親屬互動比當地居民相對的要低，而且，也只有在這些移民者的家庭中，鄉村家庭才比都市的移民家庭有較高的親屬互動，遷移所造成的地理距離是降低親屬間互動機會的主要因素，而都市化對於傳統觀念的削弱只是限制了互動的動機。

第三是工業社會中家庭結構的影響。Parsons 認為，核心家庭無論在經濟型態上或居住型態都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這使親屬在以往社會中提供生產資源或工具的功能逐漸減弱，連帶的也使親屬關係愈來愈不重要(1949:163)。這個看法在一九六〇年代被 M.B. Sussman 為首的學者直斥為謬思(1965:66)，他們的研究發現，親屬關係在現代社會中仍相當重要和普遍 (Lee, 1980:923; Fischer, 1984:161)。但是，一九七〇年代以 Gibson(1972)為首的學者也提出一些研究證據，來支持核心家庭的確比其他型態家庭的親屬關係要來得淡薄，親屬互動頻率較低。當然，也有學者注意到，家庭結構對親屬關係的影響也可能是由於社會經濟地位和種族背景等中介變項的關係，因為，家庭結構和這兩者的相關或互動都相當高(Allen 1979; Tienda and Angel, 1982)。

第四是工業社會中生產工具的改變。工業社會中生產工具和社會資源的個體化，是使傳統社會的親屬團體加速解體的主要動力 (Bott, 1957:118)。Goode(1963)在說明工業化和夫婦家庭 (conjugal family)盛行兩者間的關係時，基本上強調的也是工業社會中的經濟生產結構重視普同性，較高的地理流動和社會流動以及高度的社會組織分化。在這樣的生產結構下，個人的生產資源和其他人的相關性降低，彼此間的聯帶也減弱。西方親屬研究中發現，工人階級或黑人有較頻繁和密切的親屬互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乃是他

們與親屬之間在生產資源上有互賴的必要(Booth, 1972 ; Soldo et al., 1976 ; Allen, 1979 ; Hendrix, 1979)。

除了上面所探討到的工業化因素之外，西方學者也注意到親屬規範對親屬互動有相當的影響。這點由他們對偏女方現象的討論可以看出來。西方的偏女方現象之所以引起學者的注意，一個主要因素是它違背了西方理想上的雙系親屬關係體系(bilateral kinship system) (Murdock, 1949:44-45 ; Parsons, 1943:186-187 ; Bott, 1957:116-117 ; Sweetser, 1963 :346-347)。在這種雙系的親屬關係體系下，每個人在結婚後被要求和夫妻雙方的親屬保持相等的互動。除此，Parsons提出「孤立的核心家庭」這概念也是因為他注意到，西方雙系親屬規範對親屬關係的均衡要求，使得核心家庭和雙方親屬相對的較為隔離。但問題是：在實際的親屬互動中卻有偏向母親或太太親屬的情形。根據Bahr (1976) 和 Rosenthal (1985) 的說法，這是由於西方的親屬聯繫活動在規範上是劃歸為女人工作的關係，而且實際上也大都是如此 (Adams, 1968; Aldous et al., 1965; Berardo, 1967; Komarovsky, 1967; Sweetser, 1963)。於是，在親屬規範要求相等互動，實際的親屬聯繫活動由女性來做，而西方盛行的核心家庭又是強調「羅曼蒂克的愛」，男性處處要尊重「他所愛的女人」(Parsons, 1949) 的結果，很自然的就會有偏向母方或妻方親屬的現象出現了。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工業化對於臺灣的衝擊和在西方的影響是有些差異的。首先是都市化並沒有沖淡親屬間的關係。根據徐良熙等 (1987) 探討都市化對於臺灣家庭結構的衝擊時就發現，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方，採取擴展家庭的就愈多(2)。換言之，都市化對於親屬關係的發展並不全然是負面的。

其次，即使很多學者指出臺灣在家庭組成上有愈來愈趨向於核心化的現象，但是，這種核心家庭和西方的核心模式是不一樣的，因為，在臺灣，即使是住在大都市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也都是採取這種傳統模式 (Freedman, 1982: 410)。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獨立並沒有使臺灣的人們就採取核心家庭的組成，使親屬關係益形疏離。同樣的，謝高橋 (1985) 有關高雄遷移人口的研究也顯示，遷移也沒有使人們的親屬聯帶鬆動。這些現象似乎都說明了，工業化對臺灣親屬關係的影響可能有不同於對西方的效果。其所以如此，這也許是因為還有另外的因素可能也必須考慮進來。首先是人們的觀念和價值。若干研究顯示：傳統的大家庭價值還是普遍的存在於臺灣社會。這些傳統價值對親子

(2)徐等認為，這可能是由於都市生活費用高昂的關係。這樣的解釋也許可以接受；不過，仍有待進一步資料的證實：例如，具體的分析都市社會中不同型態家庭組成的生活費用，以及都市和鄉村同一類型的家庭生活費用是否有顯著的不同。

關係的規範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還是有相當的影響（齊力，1981：34；孫得雄，1985：43）。其次，也可能是像西方的親屬研究所發現的，是文化中的親屬規範對人們行為的規範結果。臺灣的單系父系親屬規範體系很明顯的不同於西方的雙系體系。在父系規範中，女性一旦出嫁，生是夫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必須和娘家切斷一切的聯繫。因此，社會上大多數人對晚年生活只希望依賴兒子，極少希望依賴女兒（呂玉瑕，1983：136；崔伊蘭，1985：21）。可能也就是因為如此，臺灣的都市或鄉村中的親屬關係，均很一致的仍保持著傳統的父系色彩，同時，也相當重視親屬間的關係(Hsieh, 1982；文崇一等，1984，1986；Gallin, 1985)。不過，這種情形似乎也有改變的跡象，這和社會上愈來愈多的核心家庭組成型態。呂玉瑕（1983：126-27）發現，夫家的家庭型態組成會影響婦女在家中的權力。核心家庭的婦女決策權力高於擴展家庭中的婦女。雖然到目前為止，臺灣並沒有像西方很有系統的分析家庭中不同成員之間，像父子、母子、父女、母女、兄弟、兄妹、姊弟、姊妹等等的情感聯繫的模式和強度，但是一些日常生活的經驗似乎也告訴我們，臺灣社會的家庭中應該也有情感上的性別區隔。因此，婦女一旦能在家庭中有較大的決策權或地位時，和娘家的關係應該也會出現如西方的模式，即較偏向於自己的娘家。不過，這種個人情感的取向和社會中單系父系親屬規範的要求應該會有相當程度的拉距，因此，它的偏離可能並不會像西方的雙系規範社會那麼明顯。

由上面的討論中，我們不難發現：影響親屬互動的因素事實上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是和工業化相關的各種因素，第二類則是屬於文化規範的因素。這兩類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使西方的親屬互動出現了逐漸淡化和偏女方的現象。以下，筆者即希望以臺灣的資料，針對這兩類因素來檢證這些因素對臺灣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影響。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設計

(一)資料特性

這裡我們所用的是臺灣家庭計畫研究所第五次的調查資料，簡稱KAP V。這批資料雖然並非針對親屬研究的需要而設計(參見家計所，1979)，但是它有下列的優點值得我們採用：第一，它的樣本代表性足以代表臺灣地區的母體(齊力，1981:7；蔡采秀，1988:53-55)。第二，這批資料可以避免Leigh(1982:198-200)所指出的幾個親屬研究方法學上的問題。首先是親等不會混淆，KAP V中只有問及受訪者和雙方父母之間的各種親屬關係，因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這是成年已婚子女和父母之間的親屬互動；其次是，親屬互動的種類清楚，KAP V的資料由於將拜訪頻率、金錢餽贈或急難求助都分開，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不同因素對這些不同類型關係的影響。這批資料的社會特性如表一。

表一 K A P V 樣本特性

資料來源		K A P V		資料來源		K A P V	
資料變項	人 數	%	資料變項	人 數	%		
居住地區			先生的職業				
五大都市	1079	28.20	專技人員	128	5.51		
一般都市	705	18.50	行政主管	12	0.52		
城 鎮	846	22.10	監佐人員	295	12.70		
鄉 村	1191	31.20	買賣工作	417	17.96		
總 計	3821	100.00	服務工作	113	4.87		
			農林漁牧	325	14.00		
婚後的遷移經驗			體力工人	1022	44.01		
一年以內	550	14.25	總 計	2322	100.00		
一年以上五年以內	475	12.31					
五年以上十年以內	170	4.41	先生的省籍背景				
十年以上	51	1.31	本省人	2793	72.38		
從未遷移	2600	67.38	客家人	470	12.18		
不知道	13	0.34	外省人	461	11.95		
總 計	3859	100.00	原住民	31	0.80		
			其 他	32	0.82		
家庭型態			不知道	72	1.87		
核心家庭	2339	60.61	總 計	3859	100.00		
主幹家庭	1257	32.57					
聯合家庭	225	5.83					
擴展家庭	32	0.83					
不適用	6	0.16					
總 計	3859	100.00					
核心家庭的非							
核心家庭經驗							
兩年以內	533	22.79					
二至十年	532	22.74					
十至廿年	121	5.17					
廿年以上	393	16.80					
從來沒有	760	32.50					
總 計	2339	100.00					

資料來源：1.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台閩地區戶口及住宅普查報告
2. 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第五次生育力調查」

備註：

1. 臺灣地區和K A P V的資料在居住地區、教育、年齡和職業等四個變項的比較，所得到的卡方值依序為0.5832、1.3334、0.3054以及 11.1225，均未達到顯著水準。
2. 職業部份係將 K A P V中的職業分類(見附錄一)依據民國六十九年台灣地區普查報告中的職業分類，重新加以分類得出的結果(見附錄二)。至於普查報告中的職業分類，可參見內政部(1979)，中華民國職業分類典，頁17-33。
3. 職業部份的資料只包括20-39歲有偶婦女，並去除K A P V中沒有工作的家庭主婦以及普查資料中不能分類者。

(二)變項設計

這篇研究的自變項主要包括兩類：即工業化因素和文化規範因素。工業化因素分別以居住地區、遷移經驗、非核心家庭經驗以及職業，作為都市化、遷移、家庭組成以及謀生方式等因素的指標(3)；其次，文化規範因素則是以省籍背景作為指標。這種作法係基於下列的考慮：第一是，族群背景在西方許多領域的研究中有時也被當作文化規範差異的指標之一；第二，雖然有人也把族群背景做為社會經濟地位指標；但就臺灣社會的情形而言，與其把省籍這樣的族群背景和西方一樣看成是社經地位變項，不如看成是分別代表不同族群次文化，因為臺灣並沒有像西方一樣，很一致的出現某種省籍在教育程度、職業聲望和收入高於或低於其他省籍的情形；或者即或有一般的省籍問題在，但並沒有充分的研究證據足以顯示的確有這樣的差異存在(參見蔡淑鈴，1987)。此外，一些人類學家在研究臺灣地區的親屬行為時，也傾向於將省籍背景視為是文化因素 (Tsui,1985；另參見，李亦園，1982)；而最重要的是，有些研究指出，本省人和外省人在傳統父系規範價值上的確有差異 (丁庭宇，1985；Tsui, 1985)。

其次，在依變項方面，主要包括三種類型的親屬關係，即拜訪頻率、金錢餽贈以及急難求助。其中又依關係對象分為一般的親屬關係和偏女方的親屬關係。一般的親屬關係同時包括和夫妻雙方父母的拜訪頻率、金錢餽贈以及急難求助等關係；偏女方的親屬關係指受訪者 (KAP V 的受訪者為女性) 和本身父母在拜訪頻率、金錢餽贈以及急難求助等關係上，均較和夫家公婆之間來得密切。這些關係都是以經濟型態的核心家庭為主要的分析單位。

以下將說明各變項的操作性定義：

1.自變項

(1)居住地區

(3)有一位評審認為，這裡的遷移經驗和非核心家庭經驗的長短和結婚年數會有較大的關係，和「工業化」的關係可能並不那麼大。這個質疑必須在此作個澄清。首先是，這裡所用的遷移經驗和非核心家庭經驗是當作工業化的指標，而不是和工業化平行的變項；其次，在筆者撰寫碩士論文時曾將遷移經驗、非核心家庭經驗的長短和結婚年數三個變項一起分析，結果發現，結婚年數的解釋力微乎其微，這有可能是因為遷移經驗和非核心家庭經驗在性質上也已經反映了核心家庭組成時間的長度。權衡之下，由於結婚年數在這篇文章中並不具理論意義，因而，直接以遷移經驗和非核心家庭經驗這兩個變項來作分析。

指受訪者的現在居住地。原先KAP V 的資料對都市化程度等級的劃分是以行政區劃為標準，筆者係依曾國雄等(1984:313)對臺灣地區市鎮鄉都市化程度的研究，將56個鄉鎮市區重新分為(1)中樞管理中心，(2)區域中心，(3)地區中心，(4)一般市鎮，(5)農村中心。

(2)遷移經驗

指受訪者搬到現在居住地時間的長短，一共分為五組，即(1)一年以內，(2)一至五年，(3)五至十年，(4)十年以上，(5)未曾搬過。

(3)非核心家庭經驗

指現為核心家庭在過去和夫家同住的時間長短，同住時間愈短，表示核心家庭經驗愈長；這變項共分為四組，即(1)兩年以內，(2)二至十年，(3)十至二十年，(4)二十年以上。

(4)職業

指先生目前所從事的職業，分為三類，即非工農、工人以及農人。

(5)次文化規範

即指受訪者夫家的省籍背景，其中山地人不包括在內，只有臺灣人、客家人以及外省人。

2.依變項

(1)一般親屬關係的拜訪頻率

同時包括受訪者拜訪公婆和父母、以及公婆和父母來訪的頻率，其中每天拜訪的給值5，一星期有幾次的給值4，一星期一次的給值3，一個月一次的給值2，一個月不到一次的給值1，從不拜訪的給值0。父母不在臺灣或住在一起或已歿者，視為迷失值。

(2)偏女方的拜訪頻率

將拜訪娘家頻率大於拜訪夫家的值，以及娘家父母來訪大於夫家來訪者的值兩者總加起來。娘家大於夫家的給值1，兩者相等者給值0，夫家大於娘家者給值-1。

(3)一般親屬關係的金錢餽贈

指受訪者和公婆、父母彼此間的金錢餽贈，將經常給錢的給值2，有時候給的給值1，從來不給的給值0，父母不在臺灣或住在一起或已歿者，視為迷失值處理。

(4)偏女方的金錢餽贈

即受訪者和娘家父母在金錢上的給予或接受要比和夫家公婆來得頻繁者。其值處理同上。

(5)一般親屬關係的急難求助

指受訪者有經濟上的急需時求助於夫家或娘家的父母或兄弟姊妹者。

(6)偏女方的急難求助

指受訪者有經濟急需時求助於娘家的父母或兄弟姊妹者。

除了自變項和依變項外，在分析過程中，筆者也控制了和雙方父母的距離以及交通工具這兩個變項。和雙方父母的距離指核心家庭到夫家或娘家所需的時間；到娘家所需時間較短者給值1，和雙方距離相等者給值0，到夫家所需時間較短者給值-1。其次，交通工具包括受訪者家中是否有摩托車、汽車、電話及速克達，有者值為1，沒有為0，四者加總為交通工具的便利性這新變項加以控制。

(三)分析設計

在全文的分析過程，筆者係採取下列的步驟：1.挑出核心家庭進行分析；2.控制距離和交通工具的便利性，從多元類別變項分析（即一般所說的 MCA），來看各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和影響方向。本文所用的自變項除了非核心家庭經驗外，其餘變項兩兩之間對依變項並沒有互動效果存在，因而，符合以多元類別變項做分析的要求。雖然核心家庭經驗這變項違反分析的可加性假設（Sonquist, 1970；Andrews, 1975；孫得雄, 1985），但由於筆者在這篇論文中只是想藉它的離均差來看每個變項在除去其他因素前後對依變項的影響方向，以及每一變項對依變項所能說明的總變異數比例，而不是要建立直線模型，同時，在前面的文獻討論中，核心家庭組成這一因素對親屬關係的影響很顯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項，因而，筆者在分析中仍將這變項放入，在表中只列出每個變項的變異解釋力，而不列出這些變項的總變異解釋量(4)。

(4)有關MCA這方法的運用，這篇文章其中一位評審者的看法和筆者有些差距。這位評審者認為，MCA的分析應該說明R的平方值（即這些變項的變異量），建議筆者列出。但筆者在參考Sonquist（1970）、Andrews（1975）、劉應與（1982）、呂玉瑕（1983）以及孫得雄（1985）的研究報告，並曾當面請教過一位使用過MCA的研究人員，他們研究顯示，變異量的解釋並非MCA的最大特色，因為MCA的發展就是為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所設定的一般線性模型無法有真正等比尺度變項的困擾。因此，MCA最適合用於自變項全部為名目尺度，且各變項之間彼此存在相關的多變量問題。但另一方面，MCA模型又只能處理沒有互動效果的可加線性資料，因而在運用這一分析方法之前都必須先測定兩兩變項之間是否有互動效果的存在；如果有互動效果時，則在解釋研究結果的因果關係必須非常謹慎。在此，筆者只想借重MCA能估計每一變項作用力大小（即調整後的離均差）的特性，並不在於自變項和依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因此，表中僅列出個別變項的變異解釋力。

四、分析結果

從KAP V 的資料來看，臺灣地區的親屬關係雖然經過二十年工業化的衝擊，但大多數人的社會網絡中還是以親戚為最常拜訪的對象，見表二。這一點和國內許多相關文獻的研究發現(謝高橋，1980；文崇一等，1984，1986；伊慶春等，1985；黃清高，1985a, 1985b；章英華，1987)，是相當一致的。同時，臺灣地區並沒有像西非或西方國家，發展出以參與正式社團來獲得社會安全感的結構性調節機制(Axelrod, 1956:14-16；Fischer, 1984:120)。

這個事實雖然告訴我們，臺灣社會在工業化和都市化的衝擊下，仍保有相當濃厚的原有家族社會色彩，但是在這樣的家族色彩下，究竟是否有出現如西方社會在工業化之後的偏女方現象，我們仍必需透過核心家庭和雙方父母的各類互動關係來了解。在表三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臺灣地區的核心家庭在六種親屬關係的發展上，偏夫方和偏女方的情形剛好各佔作一半。

上表顯示，臺灣的核心家庭在拜訪次數、受訪次數以及給錢頻率的親屬關係上偏夫方，保持傳統的父系色彩；而拿錢頻率、急難求助和居住遠近等關係上卻有偏女方，違背父系色彩的傾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拜訪次數和受訪次數雖然有偏向夫方的情形，但事實上核心家庭和雙方出身家庭在這兩項關係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其次，如果我們就給錢頻率和拿錢頻率這兩項關係的對照來看，核心家庭給雙方父母錢有強烈的偏夫方，其差異已達顯著水準 ($p < 0.05$)，但是向雙方父母拿錢的頻率卻偏向女方；儘管這種偏女方現象未達顯著水準，但兩相對照下卻透顯出一種非常微妙的關係：在金錢關係上，利益是流向夫家，而親屬義務卻由女方承擔。由此可見，臺灣社會的核心家庭顯然在某些親屬行為上和西方一樣有偏女方的情形。

雖然臺灣的核心家庭在某些親屬行為上和西方一樣有偏女方的情形；但我們似乎不能因此就斷言，臺灣已偏離傳統的父系單系親屬規範。因為我們如果從交換理論的角度來看，女方的行為模式事實上已違背「每個人都在追求其最大利潤」的原則，何以有這樣的偏差，其意義實有待推敲。E. Ahern (1974)研究親屬行為時所發現的，女方具有「自然而然的優越性」或許可以說明這種行為的特殊性，但是否如此，我們仍需觀察工業化和文化規範因素對一般親屬行為和偏女方現象的影響方向才能作進一步的推論。

從下面兩個MCA分析表中的離均差，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工業化因素和次文化因素對一般親屬關係和偏女方現象的影響力和影響方向。根據前面的文獻討論，工業化因素理論上對一般親屬關係的影響是負面的，但是對偏女方現象卻應該有正面的促成作用。如果臺灣社會也能發現這些西方社會所發生的現象，那麼，我們就有更進一步的證據

表二 KAPV 樣本的社會網絡

社會網絡類型		最 常 拜 訪 的 對 象				參與正式社團	
資料來源		親 戚	朋 友	都 一 樣	都 沒 有	沒參加	有參加
KAP V	人 數	2761	956	69	53	3139	706
	%	71.5	24.8	1.8	1.4	81.3	18.7

表三 核心家庭的親屬網絡發展特徵

發展方向 關係面向	女 方	相 等	夫 方	總 計
拜訪次數 人 數 %	296 24.1	545 42.6	392 32.3	1233 100.0
受訪次數 人 數 %	280 22.3	577 46.3	380 31.4	1237 100.0
給錢頻率 人 數 %	26 2.0	467 36.1	799 61.8	1292 100.0
拿錢頻率 人 數 %	107 8.3	1134 87.8	51 3.9	1292 100.0
急難求助 人 數 %	808 34.8	1115 48.1	396 17.1	1026 100.0
居住遠近 人 數 %	208 16.2	880 68.7	193 15.1	1281 100.0

來確認：工業化對親屬關係發展的影響的確是一種普遍的現象。

(一)工業化及次文化因素對一般親屬關係的影響

1.親屬間的拜訪頻率

首先，在工業化的各項因素中以受訪者的遷移經驗對親屬間的拜訪頻率影響最大（見表四）。遷移經驗對親屬間的拜訪基本上是負向的影響。從未有遷移經驗或遷移時間較短的人有較高的親屬間拜訪頻率；而遷移時間愈長者的拜訪頻率則愈低。

其次，受訪者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對親屬間的拜訪也有相當的影響。都市化程度和親屬間的拜訪是呈負向關係。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親屬間的拜訪頻率愈低；相對的，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地區，親屬間的拜訪頻率愈高。

除了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和遷移經驗外，親屬間的拜訪亦甚受非核心家庭經驗的影響。非核心家庭的經驗愈長者和親屬間的拜訪頻率愈低；相對的，經驗愈短者愈高。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事實上也就相當於核心家庭的經驗對親屬間的拜訪是正面的影響。

至於職業對親屬間拜訪頻率的影響，非農部門的親屬拜訪頻率均低於農業人口；在非農部門人口，工人親屬拜訪的頻率又低於非工人。

最後，我們在表四中也可以看到：親屬間的拜訪頻率是會隨著省籍背景這次文化因素而異的。臺灣人的親屬拜訪頻率在三種不同的次文化團體中是最低的；客家人次之；外省人最高。

這裡的分析結果和工業化論不同的是，臺灣社會的核心家庭經驗對親屬間的拜訪並沒有負面的影響。相反的，核心家庭的經驗愈長者和親屬間的拜訪也愈密切。這基本上和Parsons等所主張的「隔離的核心家庭」是不吻合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正如筆者在前面已經提到的，Parsons的「隔離的核心家庭」事實上是針對西方理想上的均衡親屬規範而發的；但是臺灣社會並不像西方是個以均衡親屬規範體系為主的社會，而是一個單系的父系社會特質。很顯然的，工業化對核心家庭的親屬拜訪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並不是一個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它會隨著不同的社會性質而異。

此外，在上述的分析結果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遷移經驗和省籍背景對親屬關係發展的影響。就臺灣而言，省籍背景和遷移經驗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播遷來臺的大量外省人口事實上也是遷移人口；但是我們從不同省籍背景卻沒有發現和遷移經驗一致的影響方向。亦即，在遷移經驗中，遷移距離愈長者，親屬間的拜訪頻率愈高；但是，遷移距離最長的外省人口親屬間的拜訪頻率卻是

表四 工業化及次文化因素對一般親屬關係的影響（控制距離和交通工具後）

依變項	和親屬間的拜訪		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		和親屬間的急難求助	
自變項	平均數=1.09		平均數=1.57		平均數=0.59	
	Eta	Beta	Eta	Beta	Eta	Beta
一、居住地區						
全國性中心	-.41	-.40	.20	.14	-.01	-.02
區域中心	-.07	-.07	-.12	-.14	.01	.01
地方中心	.19	.15	.04	.02	.02	.03
一般市鎮	-.02	.02	.02	.02	.00	.00
農村中心	.20	.21	-.06	-.01	-.01	.00
變項解釋力	.16	.15	.12	.10	.03	.03
二、遷移經驗						
一年以內	-.19	-.14	.01	.00	.05	.06
一至五年	-.42	-.42	-.04	-.06	.02	.01
五至十年	-.46	-.50	-.03	-.01	-.05	-.06
十年以上	-.40	-.42	.12	.14	-.21	-.22
未曾搬過	.36	.35	.02	.02	.00	.00
變項解釋力	.25	.25	.03	.04	.09	.09
三、非核心家庭經驗						
兩年以內	-.12	-.09	.03	.01	.01	.01
二至十年	.31	.28	-.07	-.03	.01	.02
十至二十年	.35	.14	-.18	-.08	-.26	-.24
二十年以上	-.09	-.60	-.07	-.18	-.09	-.11
變項解釋力	.13	.11	.06	.03	.11	.10
四、職業						
非工人	-.02	.01	.13	.12	.02	.02
工人	-.08	-.06	-.13	-.11	-.01	-.01
農人	.67	.27	-.38	-.36	-.13	-.09
變項解釋力	.12	.05	.17	.16	.08	.05
五、次文化因素(省籍背景)						
臺灣人	-.03	-.03	-.02	-.02	-.02	-.02
客家人	.09	.02	.09	.09	.09	.08
外省人	.22	.39	.15	.16	.15	.09
變項解釋力	.05	.07	.08	.07	.06	.04

最高。這裡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和親屬的數目有關，第二種可能是和次文化規範有關。前者在這篇分析中不能成立，因為我們的分析只包括和雙方父母之間的互動。此外，我們也控制了和雙方父母之間的距離。因此，外省人、客家人、本省人的親屬關係發展或許可以從次文化規範來解釋。西方的親屬研究指出，一個社會中的少數地位團體往往在文化價值中較強調親屬和血緣關係，他們傾向於聚集居住，並且有強烈的親屬聯帶(Adams, 1970:175; Lee, 1980:195)。臺灣社會的情形和這個結論非常一致。人數愈少的次文化團體，親屬間的聯帶愈密切。

2. 親屬間的金錢餽贈

在工業化的各項因素中，以受訪者的職業對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影響最大(見表四)。職業對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影響和生產手段的獨立性呈正向關係。生產手段愈獨立的，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愈高；愈不獨立的則愈低。因此，非工農部門要比工農人的頻率高，而工人又比農人的頻率高。這似乎意味著，生產手段的獨立與否是維繫親屬間金錢流通的重要基礎。

其次，受訪者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對親屬間的金錢餽贈是呈正向關係。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親屬間的金錢餽贈愈高；相對的，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地區，親屬間的金錢餽贈愈低。唯一的例外是區域中心，它的金錢餽贈頻率是最低的。

工業化的其他兩個因素雖然對親屬間的金錢餽贈影響很小；但是，它們的影響方向也許可以提供我們後面推論的一些依據。遷移經驗對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影響大體而言是負面的。沒有遷移經驗的人比有遷移經驗的人，和親屬間有更頻繁的金錢餽贈，這點固然和西方一樣；但是遷移在十年以上者，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卻是最高的，這可能反映出，一旦人們在遷移固定下來後，就會再重新去確立原有的社會網絡。其次，非核心經驗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呈負相關，非核心家庭經驗的時間愈長，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愈低。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核心家庭的經驗對親屬間的金錢餽贈有正面的影響，當時間愈短，餽贈頻率也就愈高。後者再次的印證前面所提到的，也是Freedman所指出的，臺灣的核心家庭內含是不同於西方社會的。這點將留到最後作較詳細的討論。

最後，省籍背景這一次文化因素對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影響，和對親屬間拜訪的影響相當一致。外省人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最高，客家人次之，本省人最低。這裡再次印證了，少數地位團體有較強親屬規範的論點。

這部份有三個現象違反西方工業化論者的假設值得我們注意：

首先是，職業對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影響和工業化論者的預期並不相同。在工業化論者看來，工業化的生產方式由於獨立性強，和親屬間的互動也就隨之減弱。這

裡的情形剛好相反，獨立性愈強的職業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愈高。因而，工業化論主張工業化會使親屬關係變弱這說法，至少在臺灣社會的親屬間金錢餽贈中無法得到支持。臺灣的情形似乎顯示，職業作為一種生產手段所反映的是它們能提供資源的能力，因而，愈弱勢的職業愈不可能有能力進行實質性的親屬關係維繫，相對的，愈強勢的愈能和親屬進行資源交換。

另一個現象是，都市化程度對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影響方向也和工業化的論點並不符合。都市化程度愈深的地區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愈高。至於，區域中心何以都市化程度僅次於全國性中心，但親屬間的金錢餽贈頻率卻是最低，這其中的意義仍有待進一步的推敲。

第三個現象是，非核心家庭的經驗對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影響，和前面的親屬間的拜訪頻率一樣，都是負面的影響。換言之，至少就拜訪頻率和金錢餽贈而言，使核心家庭產生隔離的，並不是工業化論者所說的核心家庭的經驗，而是非核心家庭的經驗。這種情形也同樣違反工業化論者的假設。

3.親屬間的急難求助

工業化對親屬急難求助影響最大的因素是非核心家庭的經驗。由表四，我們可以發現，非核心家庭的經驗愈長，和親屬間的急難求助愈少。唯一的例外是非核心家庭的經驗在二十年以上者。亦即，核心家庭的非核心家庭經驗對急難求助這親屬關係的發展，也和對前面兩類的親屬關係一樣，具有妨礙的效果。這現象再次的反駁了工業化論的看法。

其次，遷移經驗對親屬間的急難求助也有相當的影響。沒有遷移經驗的人和親屬間的急難求助，比有遷移經驗的人要來得少。同時，在有遷移經驗的人當中，時間愈長，頻率愈低。

此外，職業和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雖然對親屬間急難求助的解釋力很小，但是，它們的方向仍然值得我們注意。職業對急難求助的影響，和其獨立性呈正向關係。農人的獨立性最低，其頻率也最低；非工人的獨立性最高，其頻率也最高。其次，都市化程度和急難求助則是呈負向關係，都市化程度愈深的，親屬間急難求助的頻率愈低。

最後，次文化因素對親屬間急難求助的影響，也和少數地位有相當一致的關係。外省人和親屬間的急難求助頻率最低，客家人次之，本省人最低。

(二)工業化及次文化因素對偏女方現象的影響

1.親屬間拜訪頻率的偏女方現象

表五 工業化及次文化因素對偏女方現象的影響（控制距離和交通工具後）

自變項	和親屬間的拜訪 平均數=1.37		和親屬間的金錢餽贈 平均數=0.80		和親屬間的急難求助 平均數=0.37	
依變項	Eta	Beta	Eta	Beta	Eta	Beta
一、居住地區						
全國性中心	.18	.16	-.08	-.05	-.08	-.09
區域中心	.08	.10	.04	.06	.05	.04
地方中心	.09	.08	-.10	-.09	.03	.04
一般市鎮	-.11	-.14	.01	.02	-.02	-.03
農村中心	-.15	-.15	.06	.02	.01	.02
變項解釋力	.17	.17	.09	.07	.09	.10
二、遷移經驗						
一年以內	.11	.10	.02	.02	.02	.03
一至五年	.14	.14	-.04	-.03	.04	.03
五至十年	.17	.20	.02	.01	.00	-.01
十年以上	.08	.07	.00	-.01	-.17	-.19
未曾搬過	-.13	-.13	.01	.01	-.02	-.01
變項解釋力	.17	.17	.03	.03	.07	.07
三、非核心家庭經驗						
兩年以內	.11	.07	.02	-.01	.01	.01
二至十年	-.27	-.17	.04	.01	.00	.00
十至二十年	-.43	-.28	.20	.13	.24	-.23
二十年以上	-.37	-.18	.13	-.10	.21	-.19
變項解釋力	.23	.14	.07	.04	.10	.10
四、職業						
非工人	.08	.06	-.06	-.04	.00	.00
工人	-.04	-.06	.04	.03	.01	.01
農人	-.42	-.18	.27	.21	.10	-.07
變項解釋力	.15	.09	.13	.10	.06	.04
五、次文化因素(省籍背景)						
臺灣人	-.05	-.03	-.03	-.03	-.04	-.03
客家人	.09	.07	.09	.06	.07	.06
外省人	.13	.11	.10	.09	.15	.09
變項解釋力	.11	.07	.06	.05	.06	.04

影響親屬間的拜訪頻率出現偏女方現象的較大因素有兩個；一個是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另一個則是遷移經驗（見表五）。

都市化程度對偏女方現象有正面的促成作用，都市化程度愈深，偏女方的拜訪頻率也就愈高。同樣的，遷移經驗對偏女方現象也有正面的促成作用。沒有遷移經驗的比有遷移經驗的，偏女方拜訪的頻率要低。此外，在有遷移經驗的人當中，遷移時間愈長，偏女方拜訪的頻率也就愈高。

除了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和遷移經驗這兩個因素，非核心家庭的經驗對親屬間拜訪的偏女方現象也是一個負面的重要影響因素。非核心家庭經驗時間愈短的，偏女方的親屬拜訪也就愈高。其次，生產手段的獨立性對偏女方的親屬拜訪則是有正面的影響，獨立性愈高則偏女方現象愈明顯。

2.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偏女方現象

在親屬間金錢餽贈的偏女方現象上，以職業的解釋力最高，獨立性愈高的，愈沒有偏女方的金錢餽贈。因而，非工人的偏女方現象最低，工人次之，農人最高。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對偏女方的金錢餽贈，係呈V字形的影響。區域中心的偏女方現象最強，地方中心最弱。這現象相較於區域中心在一般親屬關係的金錢餽贈中頻率最低，形成強烈對比。何以如此，其中成因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另外遷移經驗和非核心家庭經驗對於偏女方的金錢餽贈，影響力都很小。但非核心家庭經驗的影響方向卻較為一致，時間愈長的，偏女方的金錢餽贈愈強。這一點和非核心家庭經驗在前面各項關係中所呈顯出來的影響是頗為一致的。

3.親屬間急難求助的偏女方現象

工業化因素以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和非核心家庭的經驗對親屬急難求助的影響最大。表四顯示，都市化程度愈深，偏女方的親屬間急難求助頻率愈低。非核心家庭的經驗愈長，偏女方的親屬間急難求助也愈少。

其次，遷移經驗對偏女方的急難求助，大致而言是呈正面影響。沒有遷移經驗的要比有遷移經驗的人，較少有偏女方求助的現象。同時，遷移時間愈長的，偏女方求助的頻率愈低。

職業對偏女方求助的影響在所有工業化因素中是最弱的，但是，它所呈現出來的影響方向卻和在前面各項關係中相當一致。獨立性愈高的，偏女方求助的頻率愈低。非工農的頻率最高，工人次之，農人最低。

五、結論與討論

工業化究竟對親屬關係的發展會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很多西方的親屬研究都從結構功能論的角度出發，強調經濟性或利益性因素對個人親屬行為的作用，他們忽略了，親屬行為事實上也會受到社會文化規範的約束。因此，工業化論者會認為，像工業化這種舉世皆然的發展過程在不同社會也會產生普遍性的社會性效果。這種看法至少從臺灣社會的例子來看，應該作若干的保留。

這篇研究中所用的各項工業化指標，包括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遷移經驗、非核心家庭的經驗以及謀生手段的獨立性等等，對臺灣社會的親屬關係發展一方面固然有些和工業化論者的發現一致，但另一方面也有些是較為獨特的現象。

大致而言，都市化程度和遷移經驗的影響基本上和對西方社會的影響是相一致的。都市化程度對一般親屬關係發展的影響不但和西方一樣，無論是在拜訪頻率、金錢餽贈和急難求助上有負面的影響，同時，對於偏女方現象的發生也有正面的促進作用。其次，遷移經驗對一般親屬關係的發展也和和西方一樣，是個負面的影響因素。有遷移經驗或遷移時間較長的，其親屬間的拜訪頻率、和急難求助都較低。同時，遷移經驗也會加強偏女方現象的發展。

除此，另外兩個工業化因素，即非核心家庭的經驗和謀生手段的獨立性對臺灣親屬關係的發展則和西方有些差異。西方的工業化論者認為，核心家庭的經驗和謀生工具的獨立，是使一般親屬關係淡化和偏向女方發展的因素。但在臺灣社會，我們可以發現，核心家庭的經驗和謀生手段的獨立不見得會淡化一般的親屬關係，加強偏女方的傾向。至少在金錢餽贈上，非核心家庭的經驗愈長、謀生手段愈獨立愈有助於偏女方關係的發展。其次，在一般親屬關係的發展上，核心家庭的經驗愈長、謀生手段愈獨立就愈有助於彼此關係的發展。

工業化對臺灣社會某些親屬關係的發展並沒有產生和西方一樣的影響，至少有兩層意義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是，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反映一個單系父系親屬規範體系和西方的雙系親屬規範體系的差異。我們從幾個工業化的指標對親屬關係的影響，可以發現，臺灣在不同層面的親屬關係發展上還是保留了相當濃厚的單系父系親屬規範體系的色彩。

例如，臺灣的核心家庭在不同的親屬關係層面上還是多偏向夫方發展。雖然其中向雙方父母拿錢的頻率、急難求助和居住遠近有偏女方親屬的現象，但在拜訪次數、受訪次數、給錢頻率等關係上，還是以夫方為主。同時，我們也可以發現：核心家庭的經驗在臺灣社會並未降低一般親屬關係的發展，反而有助於加強彼此間的拜訪頻率、金錢餽

贈以及急難求助。此外，核心家庭的經驗也不像在西方所發現的是造成偏女方現象的因素，至少它在三種不同親屬關係中並未很一致的造成負面的影響。例如，在偏女方的金錢餽贈上，非核心家庭的經驗反而具有正面作用。這種現象反映了臺灣社會的核心家庭在內涵上是不同於西方的，首先，它並不像西方的核心家庭可以視為一個在社會關係或生計支配上有其自主性的單位；其次，它在親屬關係的發展並不一定遵循像西方那樣的雙系親屬關係體系的規範；第三，從非核心家庭對偏女方現象的影響來看，它或許可以看成是父系家庭在社會關係或社會資源上的擴展。

其次，這種親屬規範體系的影響也反映在具有不同次文化規範的省籍背景之間的差異。首先是臺灣人在各項不同的親屬關係上，最沒有偏女方的現象；外省人則最強。其次，臺灣人一般的親屬關係在三種不同族群間是最弱的，外省人則最強。Tsui(1985:24-25)也發現和前者類似的現象，她接受Gates的看法，以三個長期的社會文化因素來解釋本省婦女和外省婦女在親屬行為上的差異。她和Gates都認為，外省人由於受西方文化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較本省人長，因而對婦女的態度並不像本省人那麼傳統；同時，外省人遷居臺灣的時間短，社會關係和親屬聯帶並不多，彼此間的接濟較為頻繁。這種解釋固然可說明前者，卻無法解釋何以臺灣人一般的親屬關係最淡。尤其是在這篇研究中已經將親屬互動的對象只限制在雙方的父母，因而，社會關係或親屬聯帶的多寡並不能用來解釋這現象。就偏女方的親屬行為而言，本省人並未像李亦園(1982)所說的有移墾社會特有的功利主義傾向，反而是更符合傳統的單系父系色彩。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西方親屬研究中對少數地位團體親屬行為的發現，也許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線索。少數地位團體在一個社會中往往由於對周遭環境的危機感，因而文化價值中較強調親屬和血緣關係，他們傾向於聚集居住，並且有強烈的親屬聯帶(Adams, 1970:175; Lee, 1980:195)。臺灣社會的情形和這個結論非常一致。人數愈少的次文化團體，親屬間的聯帶愈密切。這樣的解釋也許要比Tsui等人的解釋更能讓人接受。因為，如果要採取Tsui等人的長期社會文化因素的解釋，也許我們就該比較，不同族群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和受日本文化的薰陶對親屬關係的發展究竟有何影響。這樣的比較工作顯然並不是短期或少數幾個研究就可以下結論的。

第二是，這樣的差異可能是反映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差異；換言之，這些差異並不全然能反駁工業化論者的觀點，因為它們有可能只是臺灣社會的工業化程度還沒發展到像西方的階段。

一九八〇年代的臺灣基本上還是一個開發中的社會。雖然類似西方社會的工業社會經濟結構已開始建立，它在很多社會發展上還是相當有限，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和溝通並不是非常便利。以電話為例，西方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電話設備已經普及到不會讓空間

上的距離妨礙到人與人之間的聯繫(Litwak et al. ,1969:468)，但相對的，臺灣到一九八〇年代的電話持有率以KAP V的樣本為例，卻仍只有49%左右。在這種情形下，同樣是面對面的互動在西方和在臺灣，自然有不同的社會意義。這是由於不同的工業化階段所產生的社會影響不同所造成的。

臺灣的工業化對核心家庭的形成並不像西方一樣具有正面影響，相反的，是具有反面效果(徐良熙等, 1984:8)。徐等認為，這可能是因為都市生活費用高昂，而延緩了年輕人組成核心家庭的時間。如果我們從西方所經歷的整個工業化過程來看，那麼，這也很可能是像Leigh(1984:195) 所說的，是都市移民為適應都市生活而採取的暫時手段。換言之，這種家庭結構的複雜性和都市結構的複雜性和都市化之間不若西方呈負面相關，是因為臺灣地區在一九八〇年代進入全面工業化和都市化以前的二、三十年間，農村居民大量遷入都市的效果還殘存在都市的家庭結構中。

這兩層意義無論何者成立，都顯示傳統的家族主義對於臺灣社會在邁向另一個發展階段的正面作用；它讓人們在調適的過程中有安全的社會支持網絡，雖然會因為環境的需要而修正原有的文化規範，但卻又不致於斷然的破壞傳統的父系社會價值，使一個新分立出去的核心家庭能夠更有彈性的去獲取社會生存所需的資源，卻不會有社會失調的危機。

這篇文章雖然希望能以臺灣社會這樣以一個單系父系親屬規範為主導的親屬關係，來看工業化是否對於不同親屬關係體系的社會會造成不同的衝擊；但是卻無法取得西方的調查資料，只能透過西方的研究文獻來建立一個假想的比較對象，因此，在一些問題的澄清上難免就會停留在理論層次，而無法有直接的數據分析。其次，由於缺少跨時性的資料，因此，所謂「工業化」的影響也無法完全獲得證明。理想上，要證明工業化的影響除了像這裡以橫斷面的資料來看工業化不同指標的作用之外，最好是真的能搜集到臺灣社會在工業化前後的相關資料來比較其間的差異。但這在現實上似乎很難做到，至少是不可能完全以量化分析做到的。第三，這篇文章只以核心家庭和雙方出身家庭的父母之間的關係來論述臺灣社會的親屬關係模式，也會有推論上的區位謬誤。雖然西方的親屬研究顯示，家庭中成員的親屬關係通常是以父母為主軸，兄弟姊妹之間的聯繫並不像父母和子女之間那麼密切；不過，臺灣社會是否和西方一樣，顯然還有待證實。以上都是筆者在此無法解決的問題，但並非絕對不能解決，只要假以時日，有其他相關的研究完成，這些問題應該都可以獲得澄清。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內政部營建署（張曉春等）

1985 台灣國民住宅居住意願之研究。台北：內政部營建署

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

1979 「台灣地區第五次家庭與生育力調查」方案。台中：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

丁庭宇

1986 社會經變遷與人口轉型。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文崇一，朱瑞玲，章英華，張苙雲

1984 提高台北舊市區生活品質之策略：以大同·建成·延平為例，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市政建設專題研究報告第一零五輯·台北

1986 台北市新興工商地區與老舊地區生活品質的比較，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市政建設專題研究報告第一四零輯·台北

伊慶春，黃清高

1986 都市社區守望相助之研究。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七十五年度研究報告·台北

1987 「台北市的居住地區、社區型態與鄰里關係」，變遷中都市的社會福利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台北市政府研考會主辦，台北

李亦園

1982 「近代中國家庭的變遷：一個人類學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54：7-23·台北：南港

孫清山

1985 「台灣三十年來都市成長模式」，東海社會科學學報，4：69-86·台中：東海大學

孫得雄

1970 台灣婦女生育率差異之社會結構分析，台中：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

1985 「現代化對中國家庭的影響」，第二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香港

章英華

1987 「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央研究院暨台灣大學主辦·台北：南港

黃清高

1987a 都市社會網路與地緣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b 「都市居民社會網路之研究」，思與言，23(3)：275-302

齊力

1981 教育與親人因素對婦女生育意願影響之研究，台中：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

曾國雄，吳水源

1986 台灣地區市鎮鄉都市化程度特性之研究，師大地理研究報告，12：287-232

蔡淑玲

1987 「社會地位取得：山地・外省及閩客之比較」，台灣地區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宣讀論文・中央研究院暨台灣大學主辦・台北：南港

劉應興

1982 複分類分析程式－設計與用法，人口與家庭計劃研究報告第十四號・台中：台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

謝高橋

1985 都市人口遷移與社會適應，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瞿海源

1985 「台灣地區職業地位主觀測量之研究」，第四次社會科學研討會論文集，頁121-140・中央研究院三民所・台北：南港

英文部份

Adams, Bert N.

1970 "Isolation, Function and Beyond: American Kinship in the 1960'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2(4)：575-597

Ahern, Emily M.

1974 "Affinals and the Rituals of Kinship", in pp.279-307 A.P.Wolf(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pr ,,,ll Allen, W. R.

1979 "Class, Culture and Family Organization：the Effects of Class and Race on Family Structure in Urban Americ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0：301-313.

Andrews, Frank M., James N. Morgan, John A. Sonquist and Laura Klem

1975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spach, Donald and G. S. Rosenberg

- 1972 "Working-Class Matricentricit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4(3) : 437-442.

Axelrod, Morris

- 1956 "Urban Structure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s, 21(1) : 13-18.

Babchuk, Nicholas and Alan P. Bates

- 1963 "The Primary Relations of Middle-Class Couples : A Study in Male Domin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3) : 377-384

Bahr, Howard M.

- 1976 "The Kinship Role", in pp. 61-79 F.I. Nye(eds.), Role Structure and Analysis of the Family, California : Sage Publications, Inc..

Bott, Elizabeth

- 1957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 London : Tavistock Publications Ltd..

Bultena, Cordon

- 1969 "Rural-Urban Differences in the Familial Interaction of the Aged" ,Rural Sociology, 34(1) : 5-15

Fischer, Claud S.

- 1984 The Urban Experience. N.Y.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Fischer, Luch Rose

- 1983 "Mothers and Mothers-in-Law"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5(1) : 187-192.

Gallin, Bernard

- 1960 "Matrilateral and Affinal Relationships of a Taiwanese Villag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62(4) : 632-642.

Gallin, Bernard and Rita S. Gallin

- 1985 "Matrilateral and Affinal Relationships in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n pp. 101-116, Hsieh, Jih-Chang and Chuang, Ying-Chang(ed.), The Chinese Family and Its Ritual Behavior,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B. no. 15. Taipei : Nan-Kang.

Gibson, Geoffrey

- 1972 "Kin Family Network : Overhauled Structure in Past Conceptualizations of Family Functioning"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4(1) : 13-18.

Goode, William J.

- 1963 The Family. N.J. : Prentice-Hall, Inc..

Hendrix, L.

- 1975 "Kinship and Economic-rational Migration : A Comparison of Micro-and Macro-level Analysi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6 : 534-543.

- 1976 "Kinship, Social Networks, and Intergration among Ozark Residents and Out-migran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8 : 399-407.

- 1979 "Kinship, Social Class, and Migr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1 : 399-407

Hill, R.

- 1971 The Strengths of Black Families, N.Y. : Emerson Hall.

Hofferth, Sandra L.

- 1984 "Kin Networks, Race and Family Structur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4) : 791-806.

Hsieh, Jih-chang Chaster

- 1982 "The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Chinese Family Organization in Taiw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54 : 47-70. Taipei, Nan-Kang : Academia Sinica.

Key, William H.

- 1961 "Rural-Urban Differences and the Famil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1) : 49-56.

Klatzky, Sheila R.

- 1971 Patterns of Contact with Relatives, Washington D.C.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Komarovsky, Mirra

- 1967 Blue-collar Marriage. N.Y. : Random House.

Lee, Gary R.

- 1980 "Kinship in the Seventies : A Decade Review of Research and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4) : 923-934

Leigh, Geoffrey K.

- 1982 "Kinship Interaction over the Family Life Spa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4(1) : 197-206.

Mirande, A. M.

- 1970 "Extended Kinship Ties, Friendship Relations, and Community Size :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Rural Sociology, 35 : 261-266.

Morgan, J. N.

- 1982 " The Re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Families and Institutions and Emergency Help Patterns " ,Ann Arbor, Mi :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Murdock, G.P.

- 1949 Social Structure. N.Y. : Macmillan.

Parsons, Talcott

- 1943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 ,in pp.177-196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Revised Edition. Illinois, Glencoe : The Free Press.
- 1949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 ,in Ruth Nanda Anshen(eds.), The Family : Its Function and Destiny. N.Y. : Hap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Petersen, Karen Kay

- 1969 "Kin Network Research : A Plea for Contempora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1(2) : 271-280.

Sonquist, John A.

- 1970 Multivariate Model Building : The Validation of a Search Strategy. Michigan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traus, Murray A.

- 1969 " Social Class and Farm-City Difference in Interaction with Kin in Relation to Societal Modernization " ,Rural Sociology 34(3) : 476-495.

Sussman, Marvin B.

- 1965 "Relations of Asult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pp.62-93 Ethel Shanas and Gordon F. Streib(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Family : Generational Relations, N.J. : Prentice-Hall,Inc..

Sweetser, Dorrian Apple

1963 "Asymetr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Relationships" ,Social Forces, 41(3) : 346-352.

1968 " Intergenerational Ties in Finnish Urban Familie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2) : 236-246.

Thompson, Linda and Alexis J. Walker

1984 " Mothers and Daughters : Aid Patterns and Attachment "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2) : 313-322.

Tienda, M. and Angel R.

1982 "Headship and Household Compositionamong Blacks, Hispanies, and Other Whites" ,Social Forces, 61 : 508-531.

Tsui, Yi-Lan Elaine

1985 Are Married Daughters "Spilled Water" ? ,Women's Research Program, monograph no.4., Taipei :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nch, Robert F., Scott Greer and Rae Lesser Blumberg

1967 " Ethnicity and Extended Familism in an Upper-middle-class Suburb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2(2) : 265-272.

Wirth, Louis

1951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pp.46-63 Paul K. Hatt and Albert J. Reiss, Jr.(eds.), Cities and Society : The Revised Reader in Urban Sociology. N.Y. : The Free Press of Grenco, Inc.

Young, Michael and Peter Willmott

1957 Family and kinship in East London. Illinois, Glencoe : The Free Press.

工業化對台灣親屬關係的影響

蔡采秀*

(中文摘要)

工業化對人類各個社會生活層面的衝擊，一直都是許多社會學家關心的焦點。西方國家從一九五、六〇年代以來的親屬研究指出，工業化對親屬關係的衝擊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上，第一是親屬間互動頻率的降低；其次是親屬互動對象的改變。許多學者認為Parsons「孤立的核家庭」這概念即是親屬間互動頻率降低的結果，而西方的偏女方現象也是現代工業化社會的主要特徵。雖然Sweetser(1968:236)強調，後者和西方的親屬規範無關，但是，作者認為規範性因素也必須考慮進去，因為至少如許多學者指出的，西方是個雙系的親屬關係體系，何以會產生實際和規範間的差距，不能因此認為這就代表行為和規範無關。因此，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將就工業化因素和文化規範因素，來檢証工業化對臺灣親屬關係發展的影響是否和西方國家一樣，以及文化規範因素是否有其作用。

本文以臺灣省家庭計劃研究所第五次生育力調查資料（簡稱KAP V），首先以工業化因素和文化規範因素，針對一般親屬關係及偏女方現象的影響作模型檢定。然後再以多元類別分析（Multiple Classification Analysis），了解各變項對不同親屬關係類型的影響。

結果發現，在一般的親屬關係中，工業化因素和文化規範因素對於臺灣的親屬關係行為均有顯著的影響；但在偏女方的親屬關係中，卻只有工業化因素有顯著的影響力，換言之，臺灣社會的文化規範因素很一致的呈現出傳統父系規範的特質，無論是臺灣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這些次文化規範團體之間偏女方的現象並未有明顯的差異。其次，在各種不同類型的親屬關係上，工業化因素有不同的影響。首先，就一般的親屬關係而言，核心家庭的經驗對於臺灣社會親屬間的拜訪、金錢餽贈和急難求助均有增加作用；居住地區的都市化程度雖然會對親屬間的拜訪有負向作用，但對金錢餽贈和急難求助卻有促進作用；遷移對拜訪亦有負向作用，對金錢餽贈和急難求助則隨遷移時間而異，遷移時間愈長者，金錢餽贈愈頻繁，但急難求助則愈少；最後，職業對親屬關係的影響，其生產方式的獨立性和拜訪關係呈負向關係，和金錢餽贈及急難求助則呈正向關係。再者，就偏女方的親屬關係來看，都市化程度和拜訪關係呈正向關係，和金錢餽贈、急難求

助則呈負向關係；遷移經驗對拜訪關係也有正向作用，金錢餽贈及急難求助則和遷移時間呈反向關係；核心家庭的經驗有促進偏女方的拜訪和急難求助的作用，但卻壓抑金錢餽贈的關係；至於職業的獨立性則和核心家庭的經驗對偏女方現象的影響一樣。

關鍵詞：親屬關係、都市化、遷移經驗、家庭結構、生產手段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KINSHIP IN TAIWAN

*Tsae-Show Tsay**

(ABSTRACT)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on various aspects in social life has been a main focus which many sociologists concern with. As the findings of western kinship researchers since 1950s and 1960s reveal, the changes of kinship relationship in modern societies affected by industrialization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phenomena: first, the eliminating interaction frequency between kins, second, the higher interaction frequency with matrilineal affinals than with patrilineal kins, the former results in what Parsons calls "isolated nuclear family"; the latter causes the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toward matrilineal affinals. Although Sweester (1968: 236) emphasizes the latter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estern kinship norm but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ies, many researches have noted a discrepancy between behavior and norm in terms of western bilateral kinship norms in western societies. Therefore,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will examine not only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the effects of normative factor on kinship behavior in Taiwan.

Our findings indicates, in the general kinship relationship, both industrialization and normative factor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kinship behavior in Taiwan. Nevertheless, only the former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matrilineal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Although normative factor indicated by ethnic group in Taiwan can not be used to explain variance of behavior toward matrilineal kinship, it is the main source to explain interaction pattern in the general kinship. In Taiwan, mainlanders are the most active in kinship interaction no matter what kind the interaction type is; Hakka less and Taiwanese is the least.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various industrialization indicators on kinship

*Ph.D Candidate; Part-time Instructor, Department &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ehavior depends on the interaction type. First, in the general kinship relationship in Taiwan, the experience of nuclear family does not eliminate but forster the relationship of visiting, monetary exchange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between kins, the urbanization degree of residence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monetary exchange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migration has negative effect on visiting frequency, and monetary exchange correlate positively with the duration of migration but the emergency assistance negatively, the longer the duration, the more the frequency of exchange and the less the emergency assistance. The independence of living means indicated by occupation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the visiting frequency, but positively with monetary exchange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Second, in the matrilineal asymmetric kinship relationship, the urbanization degree, migration, the experience of nuclear family and independence of occupation all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visiting frequency between affinals, the urbanization and migration happens negatively with monetary assistance and emergency assistance; the experience of nuclear family positive on emergency assistance, but negative on monetary exchange; so does the independence of occupation, positive on emergency assistance and negative on monetary exchange.

KeyWords : Kinship, Urbanization, Migration, Family structure, Means of production